

澳门客家源流及其族群认同

袁理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利用史料论述澳门客家的形成过程, 并简要分析澳门客家认同的特点。澳门客家的形成主要有四个来源, 首先是一批客家人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因土客大械斗及同时的苦力贸易流落到澳门; 其次是国难时期, 大量华南人避难澳门, 其中不乏客家人士; 再次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 因为东南亚国家的排华浪潮, 一批海外客家人迁居澳门; 与此同时, 就是改革开放后的内地客家人移居澳门。由于澳门客家构成的多元性, 由此决定了他们认同的多层次性。

关键词: 澳门客家; 苦力贸易; 移民族群认同

中图分类号: C95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22(2010)03-0142-05

客家研究的学术史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客家人身份认同的历史。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客家研究蓬勃发展, 闽粤赣三边地区的客家、四川客家、广西客家和海外客家研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而拥有 10 万客属的澳门客家研究却相对冷落。澳门大学郑德华教授对澳门路环岛的一个海滨客家村落——九澳村作了历史的考察, 他在探讨澳门的族群认同时认为, “潮州人和客家人在澳门人数并不多”。相关学者也通过对人口结构的分析来探讨澳门文化的多元性和澳门族群认同的复杂性。由梅州文史工作者何联杰与肖伟光创作的《客家人与澳门》, 也试图对澳门客家的源流进行梳理。本文主要借助历史文献的分析, 阐述澳门客家形成的主要源流, 并以此简要分析澳门客家的认同特点, 这对于客家学研究和华人移民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澳门的历史概况

澳门古称濠镜澳, 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属百越海屿之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澳门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属南海郡的番禺

县。到晋朝咸和六年(331), 随香山属东官郡地。隋开皇十年(590), 香山由东官郡改属宝安县地。南宋绍兴二十二年置香山县^①, 澳门属香山县, 明清建置如旧。

澳门在明代史书中称为“蚝镜”(濠镜), 关于地名的来历, 县志有详细的记载: “濠镜澳山, 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 突出海中, 距县城一百四十里。凡夷船停泊必以海之湾环者为澳, 澳者泊口也; 其曰澳门, 则以南有十字门, 故合称澳门。或曰澳有南台北台, 两山相对如门云。澳为一径达前山, 故前山为拊, 背扼吭地, 前山、澳山对峙于海, 南北一沙堤亘其间, 径十里, 广五六丈, 尽处有山拔起, 跗萼连蜷曰莲花山, 径从山而名曰莲花茎, 山下有天妃庙, 北麓有马蛟石, 稍南为望厦村, 过村折而西南, 一山形繚而曲, 东西五六里, 南北半之, 有南北二湾, 可以泊船。或曰南环二湾规圆如镜, 故曰濠镜, 是称澳焉; 北则青洲山、前山、澳山, 盈盈隔一水, 兹山浸其中, 厥壤砥礪木樛嶙峋苍蔚石气, 凝青与波光相上下。”^[1]

^① 参见(清)陈澧《(光绪)香山县志》卷四《輿地上》: “香山县, 汉番禺县地; 晋以后为东官郡地; 唐为东莞县地; 宋绍兴二十二年, 分置香山县, 属广州; 元属广州路; 明属广州府; 本朝因之。”

收稿日期: 2009-03-26

作者简介: 袁理(1983-), 男, 湖北荆州人,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

二、澳门客家的形成

2006年6月,《澳门日报》刊载了“澳门客家人逾十万”的消息,引起了全球华文媒体的关注,纷纷予以转载。这种关注恰恰说明在已有客家学论著中,澳门客家是很少涉及的领域。它的形成主要有如下源流:一是澳门原住民,居住在路环岛九澳村和黑沙村,其先民于客家第五次大迁徙时来到此地,主要是清咸丰、同治年间,发于广东鹤山、开平、恩平、高要一带的土客大械斗期间及之后迁徙到澳门居住的;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葡萄牙是二战的中立国,大批华南人就近避难澳门;三是20世纪60、70年代,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地发生排华潮,而来到澳门谋生的归国华侨;四是改革开放以后,由内地迁往澳门定居的居民,由此形成了今日澳门10万客家的局面。

1. 迁海与复界问题。客家民系在赣、闽、粤边界区域发展成熟之后,由于政治与军事、人口和生计的原因,不断向外传播与迁徙,澳门客家人的出现最早从客家南迁的第四期说起。“珠江三角洲自宋元以降移民渐旺,操客家话的聚落围海造田成聚落分布甚广,澳门亦受这方面的渗透,水上居民与种菜蒔花者亦不乏使用客家话的。”^[2]清代岭南地区人口的迁移主要是客家人口迁移的事实比较明确,也有明末清初之际客家迁入香山的记录,但具体有何处客家迁居澳门却不得而知。客家人明确与澳门发生联系应该从清朝初年说起,康熙皇帝于1662年即位之初,颁布迁海令,在1683年统一台湾后,次年开海复界。准予招引各地流民或山区农民到复界地方一同垦殖。在广东地区,“迁界本身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不大,但在复界以后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并对广东社会带来了久远的影响”^[3]。传统客家聚居地土地贫瘠,人口繁盛拥挤,急需开拓新的可开垦土地,客家人就成为了招徕流民的主要对象。

迁海与复界对香山县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原因是该县因辖有澳门之缘故而免于迁界^[4],只是设关卡严查人民往来。其理由是葡人在香山县属之澳门已经生活数百年,他们不通汉语且不事耕作,每日生计都要仰仗与内地的贸易购得。如果香山迁界,势必造成澳门地方的孤绝,会导致澳门人口的生活危机,所以未遭受迁海之苦的香山人口变动比其他地区要少得多,故而有清一代并无大量移民迁入。曹树基先生根据民国《香山县

志》卷三《氏族志》统计,有清一代,自惠州、嘉应州及福建等地迁入香山县的客家氏族有18族,其人口约为4000人,客家移民人口仅占香山人口的0.4%^{[3] 380}。整个香山县的客家人口尚且如此,澳门因其地域狭小,其客家人口自然可想而知。1939年,林则徐禁烟至广东,葡澳当局递交的“华夷户口”登记当地的中国居民1772户,男女7033口^{[3] 573}。这也为澳门客家的源流定下一个基调:客家人迁入澳门基本是零星的,不具备规模性移民的特征。康熙朝而后零散迁居澳门的客家人,也就成为了澳门较早的原住民之一。

2. 广东土客大械斗及澳门的“苦力贸易”。早期澳门客家的主体是在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五期完成的,对澳门客家的形成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广东土客大械斗及同期的“苦力贸易”,这两大历史事件促使了较多的客家人流落和迁居澳门。

广东西路的土客大械斗,祸起于咸丰四年(1854),止于同治六年(1867),前后延续十三年。斗祸起于鹤山、恩平、开平、高要,蔓延于高明、新兴、新宁、阳春、阳江,浸及于新会、四会、罗定、东安、电白、信宜、茂名等州县。^[5]斗祸源于客民和土民对资源的争夺,包括土地资源与科举名额等,直接导火线则是广东的洪兵起义,客民帮助官府镇压洪兵,“客民挟官铲土”的直接后果就是土客矛盾迅速激化,斗祸很快蔓延开来。清政府此时内有洪兵、太平军叛乱之忧,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患,对械斗起初无暇顾及,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之时,械斗的发展已经失控,斗祸的死亡人数估计超过一百万。

斗祸后期,大量客家人开始逃亡,流落他乡,一部分人避难到了澳门。“古巴华工口供”中,“麦阿富供:年三十六岁,广东开平县人。同治四年避乱到澳门,有人哄我说出洋做工不甚辛苦,每月可得数圆,同我见西洋官,打合同,给银八圆。九月开船。”^[6]开平县为土客械斗发源地,麦阿富虽然没有说他本人是客民,械斗区域内的百姓有避难到澳门的,其中应不乏客民。以广东巡抚身份负责处理土客斗祸的郭嵩焘,在上疏中就直接说到香山客民的问题:“此次卓兴督军会剿,谋定后动,尽一日之力攻破大小匪巢八十余处,余匪悉窜高明县属之五坑,查五坑客民与高明土民相持数年,负山阻险其力足以自保,而由五坑东南出四会以达鹤山,由五坑东北出合水以达高明,均不过

数十里,其南径达恩平之尖石墟,为该匪民本籍。此次窜入五坑者^[5]七万余人,五坑接连老、香山等处皆系客民,足以暂息一时。”^[7]奏疏中提到的这次会剿^[5]^[273]时间是同治三年,已经是械斗的后期。在官军的进逼下,少数客家人避难流落到澳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斗祸事件解决后,朝廷将客家人聚居的赤溪地区分治,设赤溪厅,直属广州府管辖。但由于赤溪地域狭小,容不下那么多客家人,当地政府便拨出银两发给自愿迁离者,让他们去别处开垦。客家人的搬迁路线一是向西前往今广西地区,而形成了今天广西客家的布局;一是向西南前往高州、雷州及海南岛;还有一部分人后来流落到澳门的凼仔、路环等地。现居住在九澳村、望厦村等地不少客家人的祖先,都是这一时期前后迁往澳门的。

澳门的“苦力贸易”,也使得不少客家人流落于此。因葡萄牙殖民者较早来到中国,他们很早就开始从事苦力贸易,把中国的劳动力贩卖到海外做奴隶,澳门成为中国苦力贸易的一个重要市场和据点。鸦片战争后,澳门的“苦力贸易”开始进入规模化的高峰期,主要贩运苦力到古巴。1866—1873年间,经澳门输出的苦力达到极点^[8]。1874年3月27日,澳门禁止苦力贸易的法令正式生效,苦力贸易名义上被取缔了。

苦力贸易把客家人与澳门牵连起来,其线索之一是:在广东西路的土客大械斗期间,被土民或人口贩子俘获的客家人被当作苦力卖到澳门,然后被转卖到海外,只有少数幸运者被贩卖时救获,或留在澳门做工。“古巴华工口供”有相关记载:“朱甲先供:年四十一岁,广东新宁县人。我是客家,耕田为业,被本地人欺负,把我拿出卖与大西洋人,是澳门猪仔馆,逼我画合同,给我一套衣服。咸丰七年二月开船。”^[6]^[693]客民朱甲先所在之新宁县正是土客械斗的主战场之一,咸丰七年(1857)已经是斗祸开始的第四个年头了,他被本地土民趁乱贩卖出洋也就不足为奇了。朱甲先案例的重要在于,他明确供认了自己的客家身份,而且这种情况也应该不是特例。斗祸期间,也有本地人被客民俘获后贩卖出洋的案例。“古巴华工口供”载:“陈学周供:年三十一岁,广东吴川县人。同治三年,随副将曾敏行当勇平土匪黄阿狂七案,内保举外委,四年平嘉应州发贼案,内保举把总。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由省回家,路经恩平县那龙

墟,被客匪掳捉,装到广海卖与猪仔船,驶至澳门,见番官,打合同,不由分说,硬拉下船。”^[6]^[710]同治五年、六年,正是官军围剿客民、客民筑垒抗拒官兵的时候。据统计,1856—1858年间,经澳门输出的苦力达19910人^[8]^[129]。这还仅是当时葡澳官方的统计,实际苦力贩运远远大于这个数目。线索之二是土客矛盾解决后,因为赤溪地域狭小,客民为了谋生流落澳门,自卖或者被卖为苦力出洋。根据“古巴华工口供”的记载,有大量华工来自于恩平、新会、新宁、开平、鹤山、高要等上述土客斗祸的区域,他们多数是以“找工作”的借口被欺骗的^[9],这类现象说明这些区域的人们,应该有前往澳门工作传统的,其中大量客家人因为生计问题被骗到澳门出洋,也应该是肯定的。

线索一与线索二所述之客家人直接到澳门工作或贩卖时被解救而留在澳门的,就成为今日澳门客家的源流之一。根据澳门人口迁移统计的相关研究,1839—1860年,澳门净迁入人口数为72471人^[9]。其中大多数都是普通劳动者寻求生机而迁居澳门的。“(澳门)1858年11月6日发布的第2号公报刊登了苦力公司管理条例。其中较前显著不同的是要求每个苦力戴一顶圆帽式竹帽,上面标有个人的代码号,不同公司使用不同颜色,以有助于公众的区别。不论是装卸工,还是搬运工,都要履行议事会规定的义务,即在发生火灾时,各公司苦力的头等任务就是救火,对从事此类公益劳动的公司将给予税收减免。”^[8]^[133]从苦力种类之繁、苦力公司之多,我们可以推断澳门本地消化吸收的苦力也不在少数。

这几类人群形成了土客械斗和苦力贸易之后澳门客家的主体,其后之繁衍也自然是日益兴盛。澳门客家之人口至19世纪后期已经小具规模,中法战争(1883—1885年)期间,曾国荃在给军政要员的书信中屡次提到澳门客民,在给赵庆池的信中说:“近闻法人在香港、澳门一带招集客民千余人,并制中华、越南号衣多件,意在混入军中或临敌时以眩我军耳目。”在给黄弁亭的信中提到:“前得探报云:法人在香港、澳门地方招募客籍数百人前往越南助战等语。昨阅五月二十九日《香港循环日报》内载:法人前所募之客籍人共六百余人经拨百人前赴南定,现又在海防定造绸衣二千袭,短袖对襟一如中国人夏令里衣所呼为鸡翼衫款式,盖备给与所募客兵,俾得混入内地以作奸

细等语。”^[10]从上述两者材料,我们不难发现法国人轻而易举就在港澳招募了成百上千的客民,其中澳门客家自然也在上百之数。此仅系壮丁,由此我们推断澳门客家人数应该是数倍于此的。而1887年澳门人口总数为11000余人,其中葡人1000人,中国人10000人^[11]。也就是说,19世纪后期的客家人已经占澳门总人口不小的比例。

3 国难时期的避难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澳门和香港成为当时华南群众最重要的避难所。从1938年6月日军开始轰炸广州,到同年10月21日广州城沦陷,市民仓皇出城,广州人口锐减,每日出走的人数以万计,他们纷纷坐船回乡或到港澳各埠。当时由华南迁入澳门的人口激增,1938—1939年净迁入103249人,1939—1940年净迁入154806人^[9]。资料显示,澳门1927年的人口为157175,1939年则为245194^{[11][23]},可证实前者所言大致不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1年香港也随之沦陷了,因为葡萄牙是二战的中立国,大量香港同胞和东南亚华侨避难涌进澳门。“1942年2月,首批难民从港抵澳。他们被安置在学校、俱乐部、教区中……当时澳门居民非20万,而是50万。直至1945年(11月)澳门的葡萄牙难民返回香港后,一切才恢复正常。”^[12]当然难民的主体并非是葡萄牙人,因为施白蒂在该书中提到:“1943年,文德泉神甫解释大战期间澳门50万人高峰说澳门为‘一学城’。……仅香港的葡萄牙人借寓酒店、俱乐部、私宅、篷寮及学校者达3000人”^{[12][293]},这也说明大多数难民是华人。但在战争结束后,上述30万难民大部分返回了原居住地。有资料记载,在1941—1945年间,澳门迁出人口225000人^[9]，“1950年,澳门约有人口18772名”^[13]。所以,上述战争期间来澳的难民对澳门人口造成的影响甚微,留居澳门的客家人更是微乎其微了。

4 建国后移居澳门的客家人与客家归侨定居澳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因国际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少客家人移居澳门。国内移民包括建国前后移居澳门、自然灾害及历次政治事件移居澳门的,主要还是改革开放后因亲属关系或投资移居澳门的。国外移民主要源于20世纪60、70年代,因东南亚国家政局动荡,相继发生排华事件,大量华侨纷纷回国避难,一部分人选择定居澳门。国内外的客家移民到澳门刚好组成一个时

间的序列,因此一并论述这两个澳门的客家源流。

建国前后,因为对新中国的顾虑,一些客家人迁居澳门。他们主要来自中山、台山(旧称新宁)、开平、鹤山及梅州各地。20世纪50年代后期,内地发生了自然灾害,群众生活困难,广东省各地的一些客家人扶老携幼迁到澳门。“1958年12月,来自大陆中国的难民人数达到高峰,计有758916人进入本殖民地。离开的难民为715423人,剩余43493人留下”^{[13][45]}。虽然1960年左右,澳门人口达到17万的低数字,但随着澳门经济进入发展期,很多海外或散布于邻近国家的中国人愿意回来,决定碰运气定居下来。1962年,澳门人口已经增长到27万^{[13][52]}。当时,国内各种社会运动也刺激了国内移民到澳门。“1967—1968年,中国社会不稳引致人民移居澳门(濠镜原文)”^{[13][79]}。

冷战时期,东南亚人数众多的华侨曾一度被当地看作是北京的“第五纵队”^[14]。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东南亚排华浪潮,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结束,也导致了很多人回到澳门定居。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亚发生军事政变,随后掀起的反华、排华浪潮,迫使当地华侨纷纷远走他乡。因为移民澳门的手续简便,1966年至1967年间,共有5000多名印尼华侨移居澳门。

在缅甸,由于实行封闭的排外的“缅甸式社会主义”政策,1963年2月15日,政府宣布的社会主义纲领要求把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在缅华人工商业经济被国有化^[15]。中缅关系开始出现裂痕,1967年演变为中缅关系的破裂。6月26日,仰光发生反华暴乱,数十位华侨遇害,伤者众多,十余个华侨社团被焚毁或捣毁,许多店铺、企业、住宅、财物被砸抢和焚掠,大量缅甸华侨被迫离开,“到澳门定居的缅甸华侨至1972年达到高峰,共有54000多人,其中8000多是客家人”^[16]。在柬埔寨、越南、马达加斯加等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发生了类似的反华、排华浪潮。虽然不少华侨在局势稳定后返回了侨居国,但定居下来的华侨也不在少数。

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一部分在内地定居的华侨又移居澳门。同时,客家传统聚居地与澳门有联系的一些客家人,也纷纷移居澳门,形成了又一次移居澳门的高潮。“1978年,中国新的

移民潮涌到澳门。最近两年,每年平均有 20000 人(包括越南人,他们不仅是从海上来)”^{[13] 123}。“1981—1985年,在这段时间内,从中国正式移民来澳门的有 32879 人;11228 为男性,21651 为女性。”^{[13] 133} 20 世纪 80、90 年代,内地客家人都是通过亲缘和地缘关系移居澳门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澳门客家的形成主要是在最近 100 多年时间里发生的,与海外移民史息息相关。客家人移居澳门不具备规模性移民的特点,今日澳门客家人是在历次事件中层累叠加造成的。澳门客家人口构成的多样性,决定了客家文化与客家认同的层次性和多样性。澳门客家人的认同,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去把握:

1. 从时间层面上,客家人迁居澳门的时间早晚不同影响了他们的认同。最早迁居澳门的客家人如九澳村客家人,他们已经成为澳门本地的原住民,居澳时间最长,受中西文化传统的影响最深,对澳门本地的认同高于其他客家人。而近代以来移居澳门的客家人,他们还有比较鲜明的祖籍印象,但由于他们居澳已超过两代以上,他们既有对澳门本地的认同,也有对祖居地的强烈认同。至于当代的新移民,他们对澳门本地的认同就相对薄弱一些,而更多的是对大陆的认同。

2. 从空间层次上,澳门客家人原居住地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的认同。澳门客家归侨的认同,应该是最富特点的。这些客家归侨在原居住国生活的时间长短不一,其中一些甚至已经取得了居住国的国籍,他们虽移居澳门,但对原居住国的感情也不是立即就消失的,其中很多归侨还有亲属和产业均留在原居住国。他们移居澳门所取得的葡国身份,也更加丰富了他们的认同。由于澳门回归祖国,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再次得到加强。

对由大陆直接移居澳门的客家人来说,他们是通过客属社团的形式,使他们对祖籍地的认同更细致化了。澳门的客属社团联合总会由成立之初发展到现在已有 10 个团体会员,即嘉应同乡会、河源市同乡会、崇正福利会、中山坦洲同乡联谊会、闽西同乡总会、广东兴宁市同乡会、台山赤

溪田头同乡联谊会、清远同乡会及新加入的中山市神湾镇同乡会和九澳村民互助会。这些客属社团的存在,使澳门客家人有了地缘认同的区别。但是,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的认同,澳门客家人的认同肯定是统一在客家认同这个范畴之中的。由于澳门的回归,澳门客家人的族群认同,最终还是指向中华民族的认同。

参考文献:

- [1] [清]陈澧. 香山县志·卷四·輿地上 [Z]. 清光绪刻本.
- [2] 刘月莲. 澳门历史语言文化论稿 [M]. 澳门: 澳门文化研究会, 2003: 83.
- [3]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 第六卷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376.
- [4] 韦庆远. 澳门史论稿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48—75.
- [5] 刘平. 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五) [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707.
- [7] [清]郭嵩焘. 郭侍郎奏疏·卷四·官军进剿客匪连破匪巢余匪窜入高明县境五坑地方现筹办理情形疏(会总督衙) [Z]. 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 [8] [葡]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19世纪) [M]. 姚京明, 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出版, 1998: 166.
- [9] 董慧. 澳门的人口迁移及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J]. 荷泽学院学报, 2005 (1): 83—86.
- [10] [清]曾国荃. 曾忠襄公书札卷十七 [Z]. 清光绪二十九年曾忠襄公全集本.
- [11] 黄鸿钊. 澳门史纲要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23.
- [12] [葡]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1900—1949) [M]. 金国平, 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出版, 1999: 289.
- [13] [葡]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1950—1988) [M]. 思磊, 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出版, 1999: 6.
- [14] 范宏伟. 冷战时期中缅关系研究(1955—1966) [J]. 南洋问题研究, 2008 (2): 35—43.
- [15] 范宏伟. 缅甸奈温军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诉求与华人的政治地位 [J]. 世界民族, 2005 (5): 32—38.
- [16] 何联杰, 肖伟光. 客家人与澳门 [M]. 澳门客属社团联合总会, 2008: 101.

[责任编辑 龙 岩]